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

第一集

K207/8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

第一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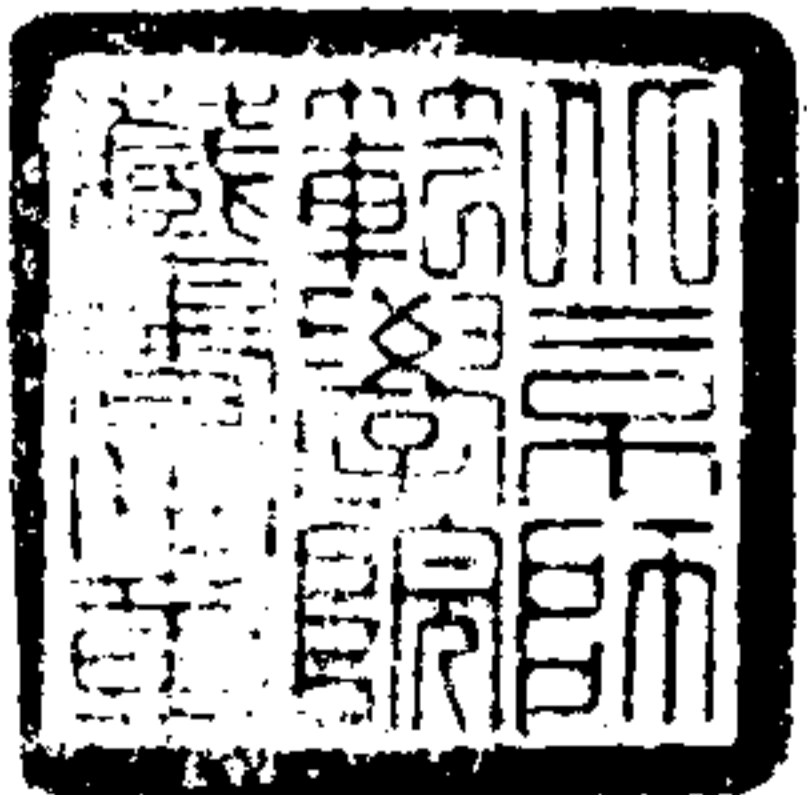
一九八〇年·长沙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74928

774928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

责任编辑:杨 坚

装帧设计:王诚龙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24,000 印张:17.75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1109·154 定价:1.80元

魏三字石徑播棘釋而錄大漢呂刑文序之命殘石及光緒初所出君奭一石近
日所出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願命諸石皆古文篆隸三體連書其亥夏日始見
季不克生所藏都帝余一石及歸至德次鄭縣馬氏諸石始知尚書有數碑乃上書
古文下並列篆隸如品字式然以女說一石與界閭^誤女聽^誤之聲頌說一說相距二十字
正為用書無逸諸石行款相合故去歲作魏石徑續考猶疑品字式不過二碑頃見
膠州柯氏所藏曾記一石乃在治忽^誤忽與捷以記之^誤記余始斷定女聽說一石
決非尋陶模文又觀此冊字^中君字一石亦品字式故尚書自牧誓我友邦冢君以
前別舉君字而其上行一言文非石可辨頗似時甲子昧爽^誤昧字此石殆周書牧

皆殘石並則魏石佳而書多用者收皆猶用品字式矣

魏石佳三體連書者每行六十字每碑三十四行或三十二行其品字式每行七十四字而行格較寬每碑不過容二十五六行上果陶漢諸殘石乃而書之第二碑收皆一石因各集既亡字數不能估計不知在弟幾碑矣

魏石佳而書品字與連珠式者非一人所書品字式者古文篆隸三體似出一手連珠式者三體似由三人分別書之而書品字式古文與連珠式古文者亦非一手不獨書人不同即文字亦不盡一如帝字果陶漢作𠄎而君爽及春秋並作𠄎子字果陶漢作𠄎而多士君爽作𠄎又𠄎字偏旁果陶漢作𠄎而周書

春秋並作甲水字偏旁昇陶漢作川而周書春秋多作公此事雖細然可

知尚書春秋在漢時雖或首古文原本謂原中原本而上石時決非一一照原本摹

寫則可斷也

品字式諸石界陶漢與收皆亦與非一人所書

品字式與連珠式二種以書法言之亦有優劣品字式三體行筆生動自是高

手連珠式中篆隸二體雖極精嚴古文則不獨書體此外用筆亦極拙劣衛

恒所識因科斗之名遂致其形者當指此碑種若品字式中古文雅使郎那

博士衛敬侯操翰恐亦不過也

甲子二月七日海甯王國維伯陽父書於京師履道坊寓廬



UAS/125

125/11

目 录

封面题字	顾颉刚
关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问题	张舜徽(1)
观堂书札(与罗振玉先生论学手札)	王国维 遗著(10)
《尚书·西伯戡黎》校释译论	顾颉刚、刘起钎(46)
公孙龙《白马论》诠释	王煦华(60)
《吕氏春秋》拾补	彭 铎(65)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校释	谭戒甫 遗著(84)
《汉书·食货志》注释札记	高振铎(97)
《汉书·地理志·牂柯郡》疏	王燕玉(101)
《说文解字约注》叙例	张舜徽(114)
论元代曹善手抄本《山海经》	周士琦(117)
彝文“以诺”印章跋语	邓子琴(123)
周武王克殷年代考	黄宝权、陈华新(125)
《春秋》一书中反映与生产有关的二三事	阙勋吾(129)
《左传》编撰考(上)	赵光贤(135)
《大招》是屈原作的吗?	郑 文(154)
“唾简”杂辨	陈抗生(165)
《书考》	钟肇鹏(176)

为杨惠之塑象问题题陈从周君所绘《角直闲吟图》	顾颉刚 (191)
宋代输出人口问题及其他	范传贤 (194)
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之不确	孟 森 遗著 (200)
附：赘言	商鸿逵 (202)
姚启圣和施琅	商鸿逵 (204)
略论王禹偁	徐 规 (206)
《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	仓修良 (212)
关于《唐语林》作者王说	颜中其 (219)
《越难志》考跋	邹身城 (225)
《越难志》	王彝寿 (232)
金明馆杂文	陈寅恪 遗著 (248)
震岳楼书札	马宗霍 遗著 (249)
读王夫之《诸经稗疏》札记	雷 敢 (253)
《江浙访书记》选录	谢国桢 (262)
考古疏记二则	罗福颐 (273)
枫窗胜语	罗继祖 (45、64、96)
释词心得例说	冯端林 (276)
稿 约	本刊编辑部 (277)

图 片

《魏石经残字跋》真迹	王国维 遗著 (扉页后)
------------------	--------------

关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问题

张舜徽

一、何谓文献？它的研究、整理对象是什么？

文、献二字联成一词，出现在中国古书上，是从《论语》开始的。《论语·八佾篇》记载孔子的话：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汉、宋学者加注释时都把“文”解为典籍；“献”解为贤人。过去封建学者们所强调的“征文考献”，便是说要了解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取证于书本记载，一方面探索于耆旧言论。言论的内容，自然包括世代相承的许多传说和文人学士的一些评议在内。本来，当我们祖先没有发明记载思想语言的工具以前，一切生活活动的事实，都靠口耳相传。这种口耳相传的材料，在古代便是史料。所以“古”字在《说文》中解释道：“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这字的构造，从十口，是十口相传的意思，是指它纵的联系——时间的联系来说的。这种世代相传的史实，都是从很早的古人口里说出来。我们当小孩时喜欢听家里上辈人讲说高曾祖考的故事，而且听母亲说的，总不如听祖母说的那样细致而亲切有味。大约时代愈早的人，懂的旧事愈多，介绍得愈详尽。我们能够武断那些丰富的传说资料都不可靠吗？所以古人研究历史，都把传说看成了重要史料。言论的另一方面，便是对历史上人、事、物的评议和见解，可以作为后来治史者的参考，价值也是很高的。过去学者们把古人的传说、言论和书本记载并重，不是没有原因的。

拿“文献”二字自名其著作，起于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他继杜佑之后，写了一部贯通历代“典章经制”的专著，共计三百四十八卷，而名之为《文献通考》。他在《自序》中指出：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这很明显地谈到他编著这部书的取材，不外两个来源：一是书本的记载，一是学士名流

的议论。由於他是宋末宰相马廷鸾的儿子，给他在当时搜集史料、接纳名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以他的书中，甄录时人议论极多，连他父亲的话都采入了。我们试检这部三百四十八卷书的写作形式，也充分体现了“文”和“献”相互依倚的作用。凡是顶格写的，都是书本的记载；凡是低一格写的，都是名流、贤者的议论；二者交相为用，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文献通考》。

其实，我国史学界，把史实和言论并重，作为撰述的两大内容，这不是从马端临开始的。远在司马迁写《史记》时，记叙之外，还收录不少文辞、言论。到了班固，写成《汉书》，凡是有关学术、政治的重要论文，都一一载入传中，从此历代诸史，都沿用了这一体例。如果再推而上之，那末，《尚书》中的《典》，叙述事实；《谟》，记载言论。《左传》一书，于叙事之外，还用“君子曰”以抒发言论。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历史书籍以“文”和“献”为主要内容，起源很早。不过取“文献”二字作为著述的标题，在马端临以前，却没有人用过。明成祖时，编《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也取义于包含各类图书在内的意思。

“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进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缙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和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

研究历史文献的任务，主要是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老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使之不走弯路错路，这便是研究历史文献的重要职责。

二、中国历史上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不朽业绩

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讎学家。所以校讎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讎学家担负了起来。假若没有校讎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尽管文献资料堆积成山，学者们也无法去阅读、去探索的。太远的事我们不必提，且从汉初的书籍情况谈起吧。汉初用以写书的材料，不外竹简和缙帛。在过去，是不可能看到汉代书籍的完整原貌的。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一批古代帛书以后，才得以考见汉初流行于社会的书籍形式和体例。出土帛书有十多种古籍，其中以《老子》为最重要，并有两种不同的写本，距离现在都有二千一百四十多年了。从这两种写本，可以了解当时由传钞古书而出现的几种情况：（1）传钞的来源不一，因而出现不同的本子；（2）传钞过程中，遗留不少错别字；（3）古人写书，多取内容相同或相近的篇章钞在一起；（4）传钞的古书，多无篇名，不分章节；（5）传钞的古书，编次前后，也不一致。只就西汉初年的传钞本帛书《老子》来看，便存在这样多

的问题，推之他书，莫不如此。足以说明汉代流行于社会、保存在朝廷的图书，是一大堆丛杂散乱、编次不同，没有篇名、错字很多的传钞本。

当公元前二十六年、汉成帝河平三年，由政府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校理群书的时候，校讎学家刘向负责主持其事。他针对当时书籍所存在的严重情况，做了许多细致工作。首先，搜集一些不同的钞本，进行对勘，把文字错了的，改过来，简策脱了的，校出来。其次，将书名、篇题、次第错杂不同的，统一起来，加以写定。最后，每书写成《叙录》一篇，介绍作者行事和书中内容。於是原来没有书名、篇题的，定著了书名、篇题；原来编次杂乱的，排好了前后秩序；原来内容重复的，除去了冗繁篇章；原来传钞错误的，改正了讹谬字体。一大堆丛杂、散乱、舛悖的古代文献，开始成为可供阅览的读物。

古代文献经过初步整理以后，虽已粗具条理，但保存在那上面的古字古言，不独字音、字义不容易了解，连字形也很陌生，需要有人替它做做翻译，加以注释。汉代学者在这方面投下的功力比较大，取得的成绩也最多，而以汉末郑玄集其大成。他在注释历史文献的过程中，也仔细进行了校书，除订讹纠谬之外，也还作了叙次篇目、辨章学术的工作，作出的贡献，大体和刘向相近。所不同的，在于他替古书作注解的功夫比较多，在介绍古代文化方面，起了翻译的作用，给后世学术界带来了许多方便。这是刘向没有做，而郑玄却做得很出色，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地方。

自从汉代学者编注群经以后，六艺经传，渐渐可读，旁及诸子百家，也相继出现专明音义的书。我们只看《隋书经籍志》所载，便可知这一类书籍的发展情况，著述是十分丰富的。但是音有地区的差异，义有古今的不同。各家的书，纷起并作。究竟哪一家的说法可信，用什么标准去衡量，便成了大问题。历魏晋南北朝以至唐初，客观上迫切需要一部总结账式的书籍，为之区处条理，使学者知所适从。唐初陆德明毅然把这一工作引为己任。他广搜汉魏六朝音切，兼采诸儒训诂，考证各本异同，写成《经典释文》三十卷以总会之。其所音释的书，以儒家经传为主，再兼及其他书籍，可算是集汉魏六朝音训之大成。他又从“辨章学术、考镜原流”的角度出发，撰成《叙录》，对经传本末、注家流别，一一详述，有裨于后学尤大，对后世整理古代文献工作者的影响至为深远。

从汉至唐的几位校讎学名家，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献学家。他们在整理古代文献的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订正讹误、厘定篇章、整齐编次、辨章学术等多方面留下了丰硕成果。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有关文献的其他方面，如书籍的存佚、类例以及收书、求书等，都是整理文献工作中所应注意的问题。唐以前的学者，很少谈到这些问题，或者谈得很简略。一直到南宋初年的郑樵，才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对整理文献的主要贡献，集中发表在《通志·校讎略》里，举凡设官专守、搜集图书、辨别真伪、确定类例、详究编次、设法流传等问题，都包括在内。此书虽很简短，但有不少创见，对后来整理文献的工作启发极大。

自从郑樵在整理古代文献工作上大胆突破校勘、注释的狭隘范围，而以广义的求书、分类、编目等内容为文献整理的主要任务后，继之而起的，有清代的章学诚。他更进一步注重书籍的质的高下浅深，首先将学者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区分为功力和学问两方面。单有一些钞辑的资料，这只能算是求知过程中的一种功力，不能算为学问；只有钻研得深，确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有所发现或发明，才能算是学问。因此，他便把古今史籍又分为著作之史和

纂辑之史两大类，连马端临三百四十八卷的《文献通考》，也只能归到纂辑一类，其他丛钞、杂钞、笔记、类书之属，更不用说了。像他这样的超特见解，便直接提高了学者们的识力。对汗牛充栋的文献图书，能够从质的方面区别高下浅深，知道哪些书是应精读的，哪些书是仅供翻检的，这对提高研究、整理古代文献的识力，无疑很有好处。

以上所谈历代学者整理文献的事实，不论校订也好，注释也好，区别部类也好，辨章学术也好，都不过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没有注意到其他可以取证的资料。在人工造纸术发明以前，我们祖先记事的方法，或是刻在龟甲兽骨上面，或是写在竹木简上面，或是镂在铜器上面，或是雕在石头上，或是书在缙帛上面。缙帛容易腐烂，竹木简也易於破损，很难保存到几千年。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很早以前用文字记事的遗物，以甲骨、铜器和石刻为多。这些材料是最古的书籍，用它们来考证古书，价值特别高，有时远在纸本的史料之上。无疑它们都是最重要的历史文献。

远在两汉，学者便已将金文、石刻看成考古的重要依据，如司马迁作《史记》，便将秦始皇巡游天下勒石颂功德的文字，像泰山、琅邪、之罘、碣石等石刻，都收入了《秦始皇本纪》，这便开辟了以石刻为史料的途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指出：“郡国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在《说文解字》中所收的古文和籀文，无疑有些是采自铜器刻辞中的字体，来充实其内容的。不过认真研究金石，到宋代才正式成为专门之学，如刘敞、欧阳修、吕大临、王黼、薛尚功、赵明诚、洪适、王象之，都是这方面的名家。赵明诚在《金石录序》中指出：“史牒出於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一语道破了金石之学的重要作用。到了清代，研究金石学的风起云涌，专家辈出，著述称盛，在整理古代文献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由于清代末年河南安阳出土了大批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这方面的研究整理工作，是从当时朴学大师瑞安孙诒让开始的。他撰述了《契文举例》和《名原》，主要是依据甲骨文考证古代文字。继之而起的有罗振玉和王国维，便推广到考证殷代史实的工作上去了，而王氏的成就尤大。他既著有《殷礼征文》、《古史新证》，又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重要论文，载入《观堂集林》卷九、卷十，给整理古代文献的人们开辟了门路，启示了方法，对近几十年间的史学研究，影响极大。罗氏所著书虽只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但他在搜集、编印、传布甲骨文和金文方面，作出了贡献，给学者们提供了极大方便，这也是应该肯定的。

三、在今天整理历史文献的工作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两大任务

时代愈后，新增的可以考证史实的文献资料便愈多。过去如此，今后更是如此。加以地不爱宝，出土的实物除铜器甲骨之外，还有简牍、帛书等有文字可考的记载和书籍，在在需人去研究整理。至于从明清故宫里清检出来的档案，更是堆积如山，亟待爬梳，需要的劳动量就更多了。这些，都已由国家大规模的组织人力去担任，自能日起有功，做出成绩。我们目前应该引为己任，努力去做的，却大有事在。在要做的工作中，有的可以一个人独自进行，有的可以组织几个人通力合作，有的可以结合更多的人分工协作，工夫总是做不完的。现在但就两方面的任务举例说明如下：

甲、改造二十四史

近年来，由国家组织人力，标点完了二十四史，诚然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就整理历史文献来看问题，这仅仅是开步走。况且标点本身，还存在一些错误，能够说有了这一套标点本子，就已经解决问题了吗？今天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给读者提供方便，那就是怎样去改造二十四史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一般整理的问题。提到“改造”二字，或者会引起人们惊讶。其实今天所常见的殿本二十四史，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改造的必要。首先宜将后人附加的话，以及错简、衍文、注语窜入正文等不符合原文的现象，加以改正删订，重新写定，这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史记·司马相如传》末称引扬雄评论词赋的话，《屈贾列传》末叙及贾嘉在汉昭帝时列为九卿的事，都是后世钞书的人附加上去的（王若虚《史记辨惑》、凌稚隆《史记评林》都已谈到）。《汉书·李广利传》有错简正文六十九字、注文二十八字（王念孙《读书杂志》已依《史记·大宛传》改正）。《后汉书·郭太传》有七十四字本为《注》中引谢承《后汉书》语，后乃窜入正文（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已校正）。这一类的错乱现象，仍让它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行吗？《史记》、两《汉书》是人们常翻的书，尚且如此（例子很多，兹特各举其一），推之其他史籍，情况也是很严重的。至于久经传写，造成文字的缺、夺、讹、衍以致前后文气不相联贯之处，尤不可胜数。我们应该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探索所得，对二十四史正文来一次写定的工作，仿清末吴汝纶写定《尚书》的体例，将史文重新写成定本，这便是改造旧史的第一步。不然的话，旧史中有些字句，本不是作者原文，作考证文章的人，习焉不察，便跟着误本书一字不易地引用，岂不是冤枉古人，遗误来学！这问题是必须首先解决的。

其次便是整理旧注的问题。注解是疏释正文的。一般书籍的情况，照例正文是大字，注解是双行小字。但是有的史注，却与一般注解有所不同。例如《三国志》本书，文字过于简洁，于史实多所疏略，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便命裴松之替它作注。这注不专於解释文谊，而重在增广异闻，补证遗佚。所以读《三国志》时，裴《注》必须仔细研究，其价值不独不在原书之下，有些地方比原书还重要。清末同治年间，金陵书局聚珍版印大字《三国志》，注文和正文一般大，只是注文低一格印，以示区别，说明注文和正文有同样的重要。我们今天要采用这一体式，对通行的《三国志》版本来一次改造，再就正文、注文分别加以新的注释。

撰述新注的过程，便是改造旧注的过程。凡是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旧注已有驳正纠订的地方，应尽量择取其精要之义，收入新注。断不可象《史记》只取三家旧注，《汉书》只取颜《注》，《后汉书》只取李《注》，一如殿本的旧内容。大抵考证之事，后出者胜，凡是清代学者和近人的创见发明，都要旁搜博采，择善而从。尽管《史记》已有日本人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汉书》有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汉书》有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三国志》有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晋书》有吴士鉴的《晋书斟注》，都是总结账式的注本，但是遗漏的精义善言，还很不少。特别是保存在文集、笔记中的单篇、条札，没有被采录的就更多了。我们必须加以补充，使注义更加详赡。

从《南北史》以下诸史，多没有注本，我们可以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将一些内容相同、相近的书合拢来读，对原书进行改造。例如读《南北史》时，有必要取《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仔细对勘，可以找出八书和《南北史》不同之处，从

而订正《南北史》的错误，并补足其缺漏。明末李清曾采取八书不同于《南北史》的材料，分注于《南北史》正文下，成《南北史合注》一九一卷。由于其书缺点太多，价值不大，所以后来既没有收入《四库全书》，也没有人把它刻印传世。其次如新、旧《唐书》，互有短长，也可两书对勘，校其异同。清代学者沈炳震虽在这方面做过工作，完成《新旧唐书合钞》二六〇卷，把两书合在一起，看来好像是一部给学者们以方便的书籍，其实在作者钞辑的过程中，既混乱了新旧二书原来的体制，也没有建立新的义例，错杂不伦，不为史学界所重视。像这一类工作，仍有待於我们运用新的方法，参进新的材料，鼓起勇气，重新去做。

一部《宋史》，为书四九六卷，是诸史中最为芜杂的一种。元末周以立便有志改修《宋史》，惜未成书。明嘉靖中，统治者打算设馆重修，以礼部侍郎严嵩总理其事，也没有修成。惟王洙私撰《宋史质》一百卷，柯维骐独成《宋史新编》二百卷，虽各有其优点，但仍不满人意。根据钱谦益的记载，明代有志在这方面做工作的还有归有光、汤显祖、王惟俭，但都没有成功（见《有学集·跋东都事略》）。清代学者像黄宗羲、陈黄中、钱大昕、邵晋涵，都精熟宋代史实，有志改作。陈氏有《宋史稿》二一九卷，钱大昕称其书为未定之稿（见《潜研堂集·宋史稿跋》）。邵氏尝欲与章学诚改修《宋史》，也没有达到目的。这是由于卷帙繁多，工程浩大，不易完成的缘故。但在今天，我们所可凭藉的资料较前人为多，所能运用的方法较前人为密，如果有决心改造旧史，自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推之读《明史》时，自可博采谈迁《国榷》、查继佐《罪惟录》、李贽《续藏书》、张岱《石匱书》，以及《皇明经世文编》、《明实录》诸书，仔细参究，而收综合研究之效。这样才能对改造旧史，打下坚实的基础。

乙、整理地方志书

人们一提到重要的历史文献，便众口同声地举出“二十四史”、“九通”之类，认为是史料宝库，而没有注意到堆积如山的“方志”，比“二十四史”、“九通”之类，还重要得多。因为“二十四史”、“九通”之类，是以王朝为中心，只是记载有利於维护统治与服从的社会秩序的事实和言论，而丝毫不注意到平民的生活与活动；它们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里面自然找不到有关广大人民的材料。至于方志，便以社会为中心，举凡风俗习惯，民生利病，一切不详载于正史的，都藉方志保存下来了。其中如赋役、户口、物产、物价，记载最为可贵。特别是赋役一项，无论在哪一部志书，都纪录得很详悉。例如清初陆陇其所修《灵寿志》，本以简洁著称，但记载赋役却特别详尽，其他方志，更可想见。在今天而欲研究过去劳动人民受压迫剥削的严重情况，方志实是唯一无二的资料宝库。其中如方言、风谣、金石、艺文诸门类所包含的内容，在在可为史部考证之用，更显示出方志的重大价值。

方志是保存社会史料的渊藪，那里面的丰富记载，是在其他史籍中不能看到的十分珍贵的考古资料。就拿清代所修州县志来说吧：嘉庆《增城县志》，叙述了“客民”的来历；道光《兴国县志》，叙述了“山民”的情况；光绪《潮阳县志》，记载了“畚民”的习俗；道光《香山县志》，记载了蓄蛊之事；同治《弋阳县志》，反映了卖妻之俗；乾隆《丰润县志》，杂记特产工业；乾隆《景州志》，附载镌刻工价；康熙《宣化县志》，记宣府左卫军官里宅之事；光绪《曲阳县志》，记石工杨、王二氏同业世婚之事；光绪《宁河县志》，记禁建回民礼拜寺之事；康熙《新城县志》，记明中叶风俗及物价之事；嘉庆《禹城县志》，记漯川韩氏村人民世奉西洋教之事；同治《宁海州志》，记金元间传道传说之事；光绪《益都县图志》，记明清两代风气大概；

乾隆《新安县志》，记及工匠日价；康熙《内乡县志》，记呼请豁免额解黑铅事；乾隆《榆林县志》，记及匠价沿革；光绪《五台县志》，记农工商贾的生活状况；同治《苏州府志》，记太湖渔船及孙春阳南货铺的沿革；乾隆《震泽县志》，历叙农蚕渔业的概况。这一类材料，都不是“二十四史”、“九通”、正续《资治通鉴》里所能找到的，诚然是研究社会史的重要依据。

我国从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几十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生活、劳动、工作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就人口论，汉族虽占绝大多数，但是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却是许多兄弟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出来的。在漫长的历史里，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也确实涌现出不少专门学者、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和英雄人物。远者勿论，即如十五世纪的航海家郑和，便是云南回族；十六世纪的思想家李贽，便是泉州回族；十七世纪的大词人纳兰性德，是满族；十八世纪的天算学家明安图，是蒙古族。十三世纪中叶、由蒙古学者写成的《蒙古秘史》，便是蒙古族最早的一部历史巨著。十八、十九世纪时，不少蒙古族学者还编成了大量有关蒙古族语文的辞典。而《辽史》、《金史》、《宋史》的修纂，都有维吾尔族人参加。从这一系列的事实，可以肯定少数民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至于历史上从少数民族中成长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更有人在。他们在学术上的创造发明，改制上的兴革改进，早已融合在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之中，成为其中的重要因素，值得我们珍重。所以少数民族的历史，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史的重点，而浩博的方志，便是我们探索少数民族历史的渊藪。特别是在历代农民革命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不可数计的大小规模的英勇斗争，都有他们自己的起义领袖。那种转战多年至死不屈的精神，沉重打击统治势力的事实，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也非从方志中进行稽考，无由得其梗概。如果我们今天还不着重于方志的研究、整理，想要编写一部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比较完整的中国通史是不可能的。即使从“二十四史”、“九通”之类的书籍中钞了一些资料比辑成书，也必然是片面的，只能反映汉族文化的一部分，不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

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亚洲东部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根据最近的统计，除人口最多的汉族外，还有五十多个兄弟民族。这些兄弟民族的人口，虽在全国总人口中为数不多，但分布的地区很广，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六十。全国约百分之七十的县市，都有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许多兄弟民族的大部分集中住在边疆地区；他们生活、活动的历史，多保存在方志中。我们今天研究、整理少数民族的历史，便须首先对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甘肃、青海、西藏、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福建、台湾等省的方志进行研究。先边疆，后内地，是我们今天整理方志的步骤，目的是首先把兄弟民族的历史从“方志”中找出来。

地方志书，有通贯古今的，也有断代成编的。就它记事的范围而言，又有几种不同的体例：统括全中国的，称“一统志”（如宋代的《寰宇记》、元朝的《一统志》皆是）；联合二省或二省以上的，称“总志”（如明代徐学谟所修《湖广总志》）；只以一省为写作范围的，称“通志”；依府、厅、州、县各自成书的，称某府、某厅、某州、某县志；也有合二县或数县之事于一书的，称“合志”；有专载一镇一里之事的，称“乡土志”。名目虽多，但以明清以来所修府、厅、州、县志为最多而最重要，也简称“州县志。”由于它的记载比较详尽，内容比较丰富，可供采摭的资料自然很多。我们整理方志，必须首先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方志在历史文献中的价值和作用，前面已经谈过了。如果拿它和“二十四史”相比，便

大有不同。“二十四史”所载，不过“圣功”、“王道”，专注重一帝一姓之兴亡。书、志、列传，有时涉及民间，但很简略，不足以反映社会现象的全部。至于方志，凡属社会制度、礼俗习尚、民生利病、不详于正史的，委曲隐微，莫不具载。过去封建学者们著书考古，如果取证于方志，便大有收获，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朱彝尊的《日下旧闻》，钱大昕的《辽史拾遗》，陆心源的《宋史翼》，都得助于方志不少。不过他们治学，终不免为“正统派”的观点所局限，没有把方志的重要提到应有的高度，自然谈不到广泛研究和整理。

过去封建学者们不能对方志进行广泛的研究和整理，也还有另一原因，便是私人无力得书。因为想在这方面做点工夫，不是几部或几十部方志所能解决问题的，而必凭藉大量丰富的方志，才能逐一涉览，提要钩玄。在封建社会的学术界，哪里有这种条件？为当时条件所限，虽有志而力不逮，这是我们应该原谅古人的。近数十年来，由于图书馆的林立，国家注意收购、保存，地方志书充栋汗牛，贮积丰富。单就北京、上海、南京、湖北各大图书馆的收藏来看，各自保存了方志达几千种之多，其他各省大小图书馆以及各大专院校图书馆所贮存的，多者一二千种，少者也有几百种，大可供史学工作者阅览。可惜的是终岁尘封，从来很少有人问津。我们今天既有责任在这方面做研究、整理工作，便当利用现存的大批图书，进行广泛的涉猎，将方志中有关赋役、户口、物产、物价、风俗、艺文，以及少数民族的史实，择取其中最为重要的材料，分类撮录，然后纂辑成书，写出一部可供采摭的史料丛编，替撰述理想的中国通史提供素材，作出贡献。

四、我们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最终目的

有人认为努力从事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工作，只是围绕着一大堆史料兜圈子，没有多大出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只要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怀大志，朝着一个宏伟目标而努力不懈，不仅大有出息，而且可以对人类作出有益的贡献。在中外古今著名历史学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凡是想在人类历史上作出总结性的工作写成一部伟大著述的，都是积年累月，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着手，再结合实际调查考察，才能取得成功。马克思写《资本论》，司马迁写《史记》，都这样做过。就拿司马迁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最成功的人。他有雄伟的气魄，宏大的规模，为了要撰述一部总结性的巨著——通史而努力工作。他凭藉父子相继任太史令的职位，掌管国家图书，根据那些已经整理成编的书籍和许多没有经过整理的零散材料，再结合实地考察所得，明定体例，着手编写，终于写成了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巨著《史记》。从远古到汉武帝时的社会变化和自然变化，都被它总结下来了。司马迁只能写到他生存的时候为止，无疑他希望后人续修己书，以至于无穷。南宋初年的郑樵便毅然把这工作引为己任。他既闭户读书三十年，积极研究整理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又自嫌孤陋，开门出游，经过了十年的四方奔走，等到回到家乡，年纪已老，身又多病，没有活到六十岁便去世了。今天流传的《通志》二百卷，不是按照他原来理想中的计划来完成的，而是他在和疾病作斗争的艰苦岁月里仓卒编出。虽不能令人满意，但他那阔大的胸襟，坚强的毅力，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

生在二十世纪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们，由于时代的进步和科学的发明，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优越都是古人所梦想不到的。谈到图书资料，不知超过了古人若干万倍；谈到实地考察，

古人需要经历几年、十几年的旅程，今天航空往返，几小时便够了。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应该有司马迁、郑樵式的人物，层出不穷，心怀大志，努力去做超过前人和前人所不能做到的事业，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今天史学领域内要做的工作很多，而编写一部体例新颖、内容丰富、足以反映中华民族全部文化的通史，是一项迫切任务。这任务便很自然地落在我们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工作者肩上。我们要为完成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奋发不懈，以达到我们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最终目的。

谈到编写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通史，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从编写的体例和形式上进行改革，使通史和教科书的内容和作用区别开来，才能全面总结中华民族几千年间的全部文化。当清末罢科举、兴学校的开始时期，江楚书局最先出版了一部《历代史略》，从唐虞三代起，到明末止，共为六卷，而每卷各分篇章，用流畅的文辞，较有条理有系统地将历代事迹叙述出来。由纲鉴的旧形式，一变而成为教科书的新形式，这大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公元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丹徒陈庆年编成《中国历史教科书》六册，作为当时中等以上学校历史教学的课本。新编本国历史而明确标出“教科书”三字，是从这书开始的。《历代史略》和这一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出现，受当时日本所编学校课本的影响很大。采用新的编书体式，对旧纲鉴来一次大的改造，这是进步的现象。为着照顾课堂讲授的方便，不得不采用分篇、分章、分节的编写形式，各随事目，作出概括简明的标题，使学生易懂易记，每小时讲多少，也依章节长短，有个断限。这是一种很适合教学的课本。所以从清末到现在，一直沿用了这种体例，只是写作上由文言文改变为语体文，观点上由陈旧的改变为新进的罢了。作为学校讲课的本子来说，是很好的。但如编写中国通史，便不必采用这种形式。既名之为通史，内容是很丰富的，门类是很繁多的，岂是几本教科书形式的本子所能包括无遗！课本为章、节所限，不得不简略，通史则不然。在今天想要写一部足以总结一个具有几千年文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九亿几千万人民的伟大国家的历史，要记载的东西太多了，不是章节体教科书的形式所能范围。我们必须敢于创新，拟订出一个新的体例，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通史的编述，为达到我们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最终目的而努力奋斗！